

## Reconceptualization of Human-media Interaction in the Light of Affordance

Yang Haoyu Liang Xiaoli

**Abstrac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metaverse, more and more scholars are focusing on the core concepts of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new media”. And whether the concept of media itself has changed and whether it will have an impact on people’s social life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for discussion. For a long time, many scholars who have advocated that media will have a decisive impact on the human world have been labelled as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ts”. In an era where everything is mediated, the society is increasingly understood as a whole being starting from, mediated by,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mediating role of media. More and more scholars have rediscovered the value of “media determinism” and renamed the stigmatized “determinis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esent the mainstream academic viewpoints through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determinism, and tries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human-media interactions.

**Key words:** Media determinism; Affordance; Media ecology; Media utopia; Harold Adams Innis

## 可供性视角下再认识人与媒介的互动关系

杨浩宇 梁晓莉

**摘要:** 随着元宇宙概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围绕传播领域的核心概念“媒介及新媒介”

作者简介：杨浩宇，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2022级硕士研究生；梁晓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

文章引用：杨浩宇，梁晓莉. 可供性视角下再认识人与媒介的互动关系 [J]. 中国新闻评论, 2023, 4 (3): 104-112.

<https://doi.org/10.35534/cnr.0403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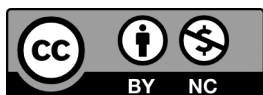
进行探讨，媒介本身的概念是否有所变化以及是否会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成为亟需讨论的内容。长期以来，许多倡导关注媒介会对人类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学者被贴上“技术决定论者”的标签。在万物皆媒的时代，社会越来越被理解为一个以媒介为起点、被中介化和参与中介作用的整体存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发掘“媒介决定论”的价值，为污名化的“决定论”正名。本文试图通过对媒介决定论发展的综述，呈现主流的学术观点，并尝试通过可供性视角为理解人与媒介的互动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媒介决定论；可供性；媒介环境学派；媒介乌托邦；哈罗德·英尼斯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媒介决定论是媒介环境学派或媒介生态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媒介决定论认为：作为技术的媒介决定了文化的形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有着决定性影响。但长期以来，传播领域的研究学者似乎都没能跳出“媒介作为技术”这一形态的桎梏，都将对媒介环境学派的认知深埋于“技术决定论”的遮蔽之下。传播学早期奠基人施拉姆也因此污名化地看待媒介决定论：“麦克卢汉和他的老师英尼斯一样，是个技术决定论者。”

但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媒介对现代社会产生的变革性影响，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媒介是连接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纽带，媒介迭代之“新”意味着为这根纽带提供了新的尺度、内容和范式（喻国明，2021）。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无条件地宣扬人的主体性而忽略技术对人的作用，就会陷入学术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胡翼青，2017）。诚然，这是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而引起学界的更深层次的批判性认识，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将“媒介可供性”引入传播学研究，为我们理解当下互联网的媒介及传播提供新的视角（潘忠党，2017）。但我们也可以从西方学者对媒介决定论发展演变所作的努力中透视人与媒介互动的关系。

## 一、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决定论

在传播研究领域，媒介也曾被视作人类交流互动的一种工具进行研究。以拉斯韦尔和施拉姆为代表的经验学派从实用功能主义出发，以量化和效果研究为方法论重点讨论媒介搭载的内容

对受众产生的影响。例如在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提到 Who、What、Which channel、Whom、What effect 等 5W 模式，将媒介看作是中性的工具，来讨论传播中的说服过程。早期传播领域的奠基人施拉姆也在《传播学概论》一书中批判了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施拉姆认为作为技术的媒介实际产生的影响作用很小，传播的内容才是应当关注的问题。而批判学派则针对媒介内容生产、消费折射出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权力进行批判分析。媒介环境学派是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独立出来的传播研究第三大学派，从 20 世纪初发展起始主要经历了三代研究学者的更迭：第一代的哈罗德·英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第二代的尼尔·波兹曼、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第三代的约书亚·梅洛维茨，他们从媒介技术本身产生的社会影响出发展开研究。

### （一）哈罗德·英尼斯的传播偏向理论

作为媒介生态学的实质开创者和媒介决定论的奠基人，英尼斯可谓最早对媒介本身展开研究的传播研究学者。20 世纪 50 年代，英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一书中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的概念，从出版自由与传播垄断的角度对美国企图通过空间扩张的方式宣扬霸权主义进行了揭露。由此，便引出了英尼斯有关媒介的传播偏向理论。

英尼斯认为，媒介使信息的传播形成了两个偏向，分别是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从古埃及媒介和文明史的角度来看，时间偏向的媒介如石刻文字、铭文雕像，它们经得起时间的流逝而耐久不消亡，因此这些信息内容可以长久保存，但因为过于沉重而不便于长途运输；这种偏向的媒介对应人类文明的延续，一些宗教国家可以利用这种媒介篆刻传统价值、等级理念，如罗马帝国的《十二铜表法》。而空间偏向的媒介如莎草纸，质量很轻便于长途运输，可以将信息内容传播得更远、更广泛，但这种媒介由于材质的问题易损毁不便长期保存，所以这种偏向的媒介也与统治阶级实现空间的扩张联系起来。基于此，英尼斯认为社会的发展形态和文化结构主要由当时社会的主要媒介偏向所决定，这便给予了媒介无与伦比的影响地位。在论述“媒介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时，英尼斯强调武力和知识的垄断是帝国实现强权的表现，除了依靠武力，帝国还需要对知识进行垄断，牢牢掌握对社会的知识灌输和控制。<sup>①</sup>而这种知识垄断主要依赖于“出版自由”的限制，这种出版自由并不意味着言论与表达的自由，相反，它更多强调美国出版商的商业自由，对印刷媒介的掌控让当局实现了对知识的垄断。由此也可以看出，英尼斯媒介决定论讨论的主要是媒介对社会形态和文明的决定作用。

### （二）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泛化理论

与英尼斯针对历史、文明、帝国、媒介之间相互关系的宏大问题的讨论相比，师承英尼斯

<sup>①</sup> 汤文辉. 出版自由与传播垄断——论哈罗德·英尼斯对媒介帝国主义的批判 [J]. 现代出版, 2013 (6): 13-15.

的麦克卢汉将研究视野从社会缩小至个人，并根据英尼斯的媒介决定论观点提出了媒介泛化的概念理论。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提到，媒介不仅是我们的日常接触并熟知的电视、广播、报纸等，任何在人与人和人与事物或事物与事物之间起到连接或联系作用的都是媒介，如此便把媒介这一概念泛化。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各种感官的延伸，例如电视是人的听觉、视觉、触觉的延伸，报纸是人的视觉的延伸，而广播是人的听觉的延伸，人们可以透过这些媒介本身感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讯息。正是因为这些媒介对于人们来说已经完全“浸入”生活，人们已经习惯于使用这些媒介，所以也无法感知自己正被这些媒介深深地影响。实际上，麦克卢汉想表达的是媒介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媒介作为一种文化或社会尺度，当媒介技术迭代更新，这种社会文化尺度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改变。而因为媒介概念的泛化，这种更迭变得更加频繁和显著，能够对人类社会产生更大的作用。媒介不再仅是一个中立的工具，而变成了一种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前提。

### （三）尼尔·波兹曼有关媒介隐喻的论述

波兹曼的许多观点由麦克卢汉的观点发展而来，与麦克卢汉主要从个体出发研究问题类似，波兹曼也从个体出发，提出了“媒介的形式决定媒介的内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类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只不过波兹曼看待媒介与文化的关系上处于较为悲观的态度，在他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中可以看出这种态度倾向。

在《童年的消逝》中波兹曼提到，电视媒介的出现冲击了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因为许多成人电视节目内容在电视媒介上出现，许多儿童在陪伴父母观看电视媒介时就极易被电视中的成人因素侵蚀，导致儿童和成人的文化边界模糊甚至消散，迫使儿童“成人化”，他认为这种负面的影响正是电视媒介的出现导致的。而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波兹曼也列举了电视媒介出现的弊端，人们坐在电视机前只能被动地接受电视媒介传导的讯息，降低了人们的读写能力。在《技术的垄断》中波兹曼则将技术等同于洪水猛兽的概念，他强调技术对文化的宰制作用可以从技术从属于文化发展为技术攻击文化，最后垄断文化，信息可能会失控，整个社会都可能处于没有文化价值和精神文明存在的无乱信息中，技术也因此让人类社会土崩瓦解。

通过波兹曼的“媒介批评三部曲”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个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波兹曼也将媒介与技术放在同等的位置进行讨论，由媒介决定论到技术决定论，只不过他在讨论决定作用时是持批评的态度，认为媒介或技术的决定作用是有害的，而波兹曼也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发展为“媒介即隐喻”，强调媒介产生的决定作用具有隐蔽性、普遍性和建构性。隐蔽性指人们总是会陷于创造性麻木的状态，对自己受到媒介的影响一无所知，意指媒介对人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普遍性是从麦克卢汉媒介泛化的概念而来，泛化的媒介参与了人类和

世界的交流联系，也因此中介了人们对外界的感知和理解，这种中介的影响是普遍的。而在普遍性的媒介影响下，人们透过媒介认知的世界可能又会与事物本身产生区别，波兹曼因此认为经过媒介的中介处理，人们对世界的感知会产生一种超越自身意义的理解方式。

#### （四）约书亚·梅洛维茨引入戈夫曼的场景主义

梅洛维茨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在前人学者的基础上为媒介决定论引入了戈夫曼的场景主义进行研究。梅洛维茨认为，波兹曼等人虽然解释了媒介技术对人们生活会产生巨大影响，但没有指明为什么会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因此他不仅引入了场景主义，还将戈夫曼的场景拓展至信息领域。媒介会塑造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而经过媒介塑造的社会环境会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行为的方式比传播的内容更重要，这也回到了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的本质内涵。梅洛维茨也进一步对媒介的更迭如何改变环境、这种环境的改变又会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何种影响进行了探讨，试图将媒介、社会环境、人的角色纳入同一个框架下研究。

## 二、对媒介决定论的批判

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观点将媒介视作社会的中心，以此讨论了其对社会环境变革中的决定作用，因而对大到整个社会、小到个人都有影响作用。部分学者认为媒介环境学派学者提出的观点都是基于单向的作用，即媒介对社会、对文化、对个人的作用，因此众多学者对媒介决定论的批判是没有从双向作用的角度来看待媒介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这些学者认为社会环境表现出的社会文化对媒介的作用不能忽视，看似由媒介所产生的影响也由多种因素综合造成，并不能说明媒介技术的决定作用。

#### （一）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选择论

威廉斯认为不论是印刷媒介还是后来产生的电视媒介，这些技术本身的出现都是在一定社会文化和社会关系之内进行的。因为媒介技术产生的前提是经过大量实验验证完成的技术，而实验产生的动力来源或前提条件是社会文化的选择和需要。例如威廉斯认为无线电广播的诞生起初正是因为军事建设的需要，后经过商业和政治的需要才逐渐在社会上普及。针对媒介环境学派学者提到的电视媒介对普罗大众知识结构与娱乐生活的决定性影响，威廉斯同样予以反驳，他认为不应该仅强调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而忽略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因素，倘若媒介本身就是决定性影响因素，那么社会中其他诸如经济、政治因素则变成了一种效果，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戴维·莫利也认可威廉斯的观点，媒介技术若想发挥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作用必须经过人的认可与解释，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威廉斯从社会文化选择、需要的角度对媒介决定论予以批判,他认为社会文化对技术是具有文化选择性的。他也提供了一个综合多方面因素来看待社会变革和人类行为方式的视角,他强调不止有媒介技术的影响,还应当综合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也不提倡文化的决定作用,许多学者也因此认为威廉斯的观点是一种文化选择论。

## (二) 尼克·史蒂文森对英尼斯与麦克卢汉的观点批判

史蒂文森在威廉斯的理论观点基础上,也对媒介决定论进行了批判。首先,他认为英尼斯的媒介偏向理论过于绝对,在史蒂文森看来,媒介不应该被简单地一分为二从两个偏向来看,尽管这样描述划分可以较为直观地反映媒介的特征,但具有局限性,因为有些媒介既具有空间偏向也具有时间偏向,不能割裂地看待。其次,史蒂文森借助了威廉斯的观点,认为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观点并没有从社会化的层面进行分析,没有考虑到媒介存在的社会关系,而仅仅是找了意识形态的理由。<sup>①</sup>

威廉斯和史蒂文森提出了“媒介从哪来”这样一个看似绕不开的问题,他们认为按照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媒介是一个自因,媒介环境学派将媒介技术从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讨论,带来的结果就是媒介自己推动自己产生和发展,这就让文化理论家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媒介决定论予以反驳和批判。

## 三、对媒介决定论的遮蔽认识

根据施拉姆对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评价来看,技术决定论或媒介决定论是一个带有贬义的错误论断,一些支持媒介决定论的学者在反驳威廉斯等人时也极力辩称媒介决定论不是技术决定论,以此把两者区分开来。实际上,这些学者提出的论点也都有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技术决定论是错误的。许多学者在论述英尼斯的媒介决定论观点时,也着重表述其媒介对社会形态的决定作用这一观点,而忽视了英尼斯对于社会权力和复杂社会关系的其他论述,这种将媒介决定论无限简化的表述无疑会陷入对媒介决定论的遮蔽认识。

### (一) “媒介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思想

媒介决定论的论述主要围绕两个关键概念展开,其一是“媒介”,其二是“决定”。关于“媒介或媒介技术”,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泛化论都进行了阐释;而有关“决定”的论述,媒介环境学派认为媒介对社会形态的决定是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无论是基于技术乐观还是技术悲观的态度,他们都认为媒介产生的影响效果是直接的。因此,后来的学者在论述媒介决定论时就极易被先前学者的观点影响,而无限简化或放大这种“直接的决定作用”,

<sup>①</sup> 罗崇宏. 媒介研究中的科技与文化——对媒介决定论的再思考[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26(3): 125-128, 144.

将媒介技术看作是社会进步的动因或将其视作阻碍社会文化发展的施动方，便容易产生“媒介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思想，突出媒介技术的作用。

如果从支撑这些论断的理论起点来看，这种思想是建立在庸俗进化论、功能主义、媒介中心主义观念基础之上的论断。<sup>①</sup>因此，如果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本身想要传达的就是一种“媒介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思想，那么众多反对、批判媒介决定论也无可厚非。文森特·莫斯可与詹姆斯·凯瑞就针对这种“媒介乌托邦”的思想给予批评，他们认为这种媒介技术决定论已经堪称神话，根据这种论述，每当出现一种新的媒介技术，整个社会都会被颠覆，不论是时间还是空间，抑或是权力都会被新媒介带来的影响覆盖，从而创造出新的历史，“电子技术是人类的施主”。事实上，莫斯可认为媒介无法创造新的历史，因为新媒介的出现是让社会变得更加复杂，迫使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重新做出调整 and 适应，而“乌托邦式”论断反映出的技术乐观主义背后则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性。

美国的实证主义传播学思想也倾向性地体现出媒介中心主义的观点，这些实证主义者认为传播科技是造成美国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而早期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施拉姆则对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予以批判，但他们自己的论述也没有脱离“媒介是孤立的某类媒介”，他们认为媒介及其承载的内容也是以因果关系的方式激发社会功能，与“媒介乌托邦”式的思想别无二致。陷入这种“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式”的思想是导致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逐渐变得污名化的重要原因。

## （二）媒介与新旧文明的交替

除了“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式”思想论断体现出的媒介对社会形态的直接决定作用，造成人们对媒介决定论产生抵触的原因是对媒介决定论的奠基人——英尼斯观点的另一误解：一种新媒介的出现会造成新文明的诞生和旧文明的消亡，两者在具有时间上是一一对应的。<sup>②</sup>按照英尼斯的媒介偏向理论和媒介决定论的论述，从偏向时间的石头到偏向空间的莎草纸，理应造成社会的变革更迭，但事实上社会形态是否因此直接改变？

其实，在英尼斯的论述中，从偏向时间的石头到偏向空间的莎草纸的迭代是共存式的，例如在古埃及媒介和文明史中，石头是作为一种权威和精神文明的寄托而存在，莎草纸则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莎草纸都作为统治的工具存在。石头和莎草纸共同构筑了宣扬王权的方式。直到僧侣阶层逐渐将莎草纸作为上通下达的工具使用，莎草纸作为媒介的功用才缓慢体现出来，而石头也并未销声匿迹，始终承载着记录宗教祭祀的工具而存在。因此，英

<sup>①</sup> 胡翼青. 为媒介技术决定论正名：兼论传播思想史的新视角[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7, 39(1): 51-56.

<sup>②</sup> 艾克热木江·艾尼瓦尔, 吴浚诚. 英尼斯媒介演进观再阐释——基于古埃及媒介与文明史的注解[J]. 青年记者, 2020(32): 17-18.

尼斯有关新兴媒介会造成社会形态更迭的论述本意也并未是诸多学者认为的具有时间上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平衡，旧媒介会受到新媒介的冲击，但新媒介对社会形态造成的影响是一个漫长的社会过程，看似一蹴而就式的媒介影响也容易造成对媒介决定论的遮蔽性认识。

## 四、可供性视角理解人与媒介的互动关系

所谓可供性，原是指行为主体在物理环境中潜在地采取各种行动的可能性，源自主体对效用的主观感知与技术的客观品质之间的相互作用，<sup>①</sup>因此，部分学者也将此概念引入传播研究领域探讨作为主观主体的人类与作为客观技术的媒介之间的关系。在可供性的视角下，人与媒介技术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将媒介技术自身的功能属性与人类本身的主观能动性置于同等地位考量，人类要达成相关社会实践需以人与媒介的互动为基础。

### （一）媒介可供性

可供性这一概念最早由生态心理学学者布吉森提出，随后广泛解构于设计学、传播学，以及人机交互等领域，在不同领域可供性这一概念也发展出不同内涵。在传播研究领域，学者主要基于该视角解读人与媒介技术的互动关系。首先，媒介技术具有功能性，不同的媒介可以让人们体验不同的功能，也赋予用户采取多样行动的可能；其次，媒介技术的实现也依赖人的介入，需要人与技术产生真正的关联。传播可供性被定义为受众对效用的主观感知与改变传播实践或习惯的客观技术品质之间的相互作用（Andrew Richard Schrock, 2015）。<sup>②</sup>部分学者也将媒介可供性拆分成了多个要素进行理解，例如我国学者将其理解为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三个元素（潘忠党，2017），也对应了媒介作为技术的功能属性；并针对这三个元素提出了细致的分析解读框架，例如移动可供性可以理解为可携带、可获取、可定位、可兼容，而社交可供性可以拆分为可致意、可传情、可协调、可连接（喻国明，2019）。这些功能属性是新时代媒介技术发展带来的变化，对人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国外学者也针对媒介可供性分别提出了数字民主可供性、想象可供性等元素，将其放在公众政治参与的角度去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学者提及的移动可供性还是社交可供性，不同的媒介因为具有不同的自身属性，所以可以提供给人们不同的功能体验，但这种多样的可供性并非是这些媒介自身属性的简单相加，而是依据人们在不同使用情境下与媒介的不同互动完成，这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人与媒介互动”的新视角来理解媒介技术对社会形态的影响作用。

<sup>①</sup> 喻国明，赵睿. 媒体可供性视角下“四全媒体”产业格局与增长空间[J]. 学术界, 2019(7): 37-44.

<sup>②</sup> Schrock A R. Communicative affordances of mobile media: Portability, availability, locatability, and multimer dualit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5(9): 18.



## （二）再理解人与媒介的互动

可供性概念的提出者布吉森强调，可供性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属性，一方面，可供性需要主体的相关实践实现功能效用，另一方面，主体的相关实践也会影响其对客体可供性的感知。李伏诺（Lievrouw）也在此概念的基础上发展了关系性视角的可供性框架，强调人和技术的互动关系。

带有污名化倾向的“技术决定论”和“媒介决定论”在人们的认知中占据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学界也围绕技术和媒介是否具有直接改变社会形态和社会文化、决定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这一问题争执不下。可供性概念给予我们一种理解人与媒介关系的新视角：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新兴媒介技术层出不穷，提供了更多新的可供性，人们能够根据媒介的特性功能，从自己的需求和目的出发在特定的环境中选择使用一种媒介或多种媒介来达成实践，也就是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例如舆论监督和政治参与；但同时人们也可能依靠社交媒介平台的可供性产生非理性的互联网文化，对网络社会治理发出挑战，即媒介技术对社会形态和社会文化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因此，可以将人与媒介技术的关系看作一种互动的关系，两者彼此关联又相互影响，由此便跳脱出“决定论”的单一思维桎梏。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媒介的生态环境会更加沉浸化，人与媒介的互动性也会更加显著。

## 五、结语

在万物皆媒的时代，社会越来越被理解为以媒介为起点、被中介化和参与中介作用的整体存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发掘“媒介决定论”的价值，为污名化的“决定论”正名，试图印证媒介效果的影响作用。此外，部分学者也尝试修正过去对“媒介决定论”的遮蔽认识，例如从一种制度的视角来重新理解英尼斯的媒介演进观，认为英尼斯理论研究的意义和出发点是探索，构建了“媒介-行动者-社会制度”的框架，而非对每一种具体的媒介技术进行回溯解构；也有学者从“媒介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视角重新理解技术决定论与媒介决定论，指出“技术决定论”本身就容易被当作一种错误的论断标签加以陈述，因而引发一众学者对媒介环境学派的声讨。

不论是历经三代媒介环境学派学者发展起来的媒介决定论，还是后来学者对媒介决定论的批判性认识，都加深了我们对媒介效果的认识。与此同时，“可供性”概念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传播效果“决定论”的基础上，增添了对认知过程的考量，<sup>①</sup>也让我们以更全面的视角关注人与媒介的互动关系，从而能够在当下的互联网融媒体传播时代重新审视媒介与社会制度的复杂关系。

① 蒋俏蕾，张自中. 全媒体时代的决策与素养：媒介可供性与分布式认知 [J].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2022 (3): 120-132.